

索宝祥 / 著

LUNYUZHIGUANZHIDAO



论语

之 为官之道

珍品国学文库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子曰：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予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论语

之
为官之道

珍品国学文库



《论语》之为官之道

索宝祥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8·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之为官之道 / 索宝祥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80176-295-5

I. 论… II. 索… III. 论语—应用—领导学 IV. 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8477 号

书名:《论语》之为官之道

作者:索宝祥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230 千字

印张:16.75

印数:1—5000

版次: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论语》中的领导科学

(代序)

书生论道，向来可笑！而可笑之处大抵是因为乐于“坐而论道”。道再好，倘若虽光芒四射而远离人间烟火，论者又置身道外，那纵然滔滔不绝、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也是枉然。古往今来，“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中国民间，“道”就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是万物变化发展的总规律。所以有大道，有小道；有天道，有人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是天道。战争期间不杀平民，不虐战俘，不放贫铀弹，那是人道。梁山好汉祭起杏黄旗，虽出自人道，却自称“替天行道”。今天的领导干部仕途顺畅，其实已经说明“道行高深”了，而这“道行”至少包含了这样几个因素：工作干得漂亮，忠实履行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这是“忠”；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处理得当，和谐顺畅，这是“礼”；尊重领导，爱护部属，这是“义”；领会上级组织精神准确敏捷，头脑清醒，这是“智”……瞧，生活在儒家文化熏染的国度，我们的领导干部身上已然具备了这样一些品质，只是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儒学角度来给自己定位，而是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体系。

“道”与“术”是有本质区别的。孔子讲治国之道，韩非讲治国之术。“养生之道”与“养生之术”是什么关系？前者讲的是道理，比如心胸豁达、淡泊名利、营养均衡等，后者讲的是方法，比如不要和兄弟争夺遗产，不要跟同事斤斤计较，不要跟邻居“万里修书只为墙”，菠菜和豆腐不要同吃，多晒太阳等等。拿领导工作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管人”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重视“驭人”之“术”，只是把员工

简单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被管者明显站在管人者的对立面，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则讲究“以人为本”之“道”，在理念上把员工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也才不会陷入“治”人、整人的怪圈。“为官之道”讲的是做官的道理，或者说是做官的“应然状态”。而“为官之术”才是做领导的具体工作技巧。同样的道理，《孙子兵法》也是讲取胜之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等精彩！美国军方对此非常熟悉，并从中寻求制胜之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军战场总指挥、中央总部司令弗兰克斯就说过：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幽灵似乎徘徊在沙漠上每部向前推进的战争机器旁边。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位陆战队上将脱口而出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金一南先生多次访问美国之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当我们在骄傲自己辉煌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之时，当我们热衷于把《孙子兵法》作为一门高深学问加以学术式研究和理论意义评价之时，美国人却在从中国古老的军事理论中，发掘出指导现代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不光是我们的‘道’，我们还必须防备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的确是我们必须思索、必须警惕和必须转变的。”^①

本书希望介绍给诸位的，是为官从政的正面要求，或者讲从文化的角度如何理解做官是怎么回事。

毋庸置疑，《论语》对公务人员是有价值的，且不说它从“做官先做人”的角度提供了道德滋养，单就今天我们所讲的领导科学来说也有着借鉴意义。我们试从领导观念、领导形象、领导行为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论语》的领导观念

文化是人的根本属性，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从政者的领导观念也必然产生不可小觑的作

① http://blog.people.com.cn/trackback.do?wlog_id=1192088382727619

用。中华民族在东方繁衍生息几千年，儒、释、道等思想文化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人们的举手投足、眉目顾盼之间，无不洋溢着文化的气息。作为最高领导人，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考虑其文化土壤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便是以对人的尊重为根本特性，这固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念，但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同样重视对人民的关怀。孔子解释其理论体系中最高境界“仁”时，以“爱人”作为界定标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民众的关怀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建国后，党的几代领导人也都高举着这一旗帜。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最为响亮，也最为精辟。邓小平同志谈到改革方向时，有“三个有利于”之说，其中之一便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了，而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那么改革就失败了。江泽民“三个代表”也要求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同样体现出宽容、温和、有度的君子风范。2004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其中谈到“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要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并容许事物多样性的存在。在文化、思想、宗教、经济方面强求一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五音相谐成音乐，五味相调为烹饪（自个儿家里那叫“做饭”）。拿到政治场合来讲，就相当于开完党委会，对于最后结果，“保留个人意见，但服从党委决定。”2006年11月23日，胡锦涛会见印度总统时，特意引用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意在告诉对方，中国自己要发展，亦希望同其他国家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希望印度打消顾虑，消除误会，中国这只睡狮就

算醒来也不会伤害无辜。就连与别国发生利益冲突乃至冲突升级时，我们的领导人也往往并不表现出西楚霸王式的怒目圆睁，而是颇为含蓄地表明立场。当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沙群岛总是纠纷不断。会见时，菲律宾总统说：“南沙群岛离菲律宾很近哦。”小平同志回敬一句：“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哦！”从此那个地方消停下来。

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领导观念自然也是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中国重德治，西方重法治。西方政治学里有一条假定，把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假定为无赖。所以西方国家才设计出种种法律条文加以约制。而中国的政治理论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人都要做君子，所以提出了许多道德规范。两者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优劣势，发生的效用当然也是有差别的。我们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方，而是积极寻求“优势互补”，吸收、融合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世界大同，“环球同此凉热”。鉴于此，必须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生物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与他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的现象，提出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此后的斯宾塞更是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比作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其最大错误，在于主张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来看待人类社会，把人类兽性化。美军在伊拉克的惨重伤亡，便是对“鹰派”推行“霸道”的沉重回应。而儒家文明崇尚“王道”，讲求礼义仁乐，主张人们遏制自己的欲望，多为别人着想，从而使人们挣脱“丛林法则”的

局限，向“自由王国”迈进。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丛林时代”，比如三国和五代十国时期，但都受到来自儒家主流阵营的纠正，邪不压正，道义的力量始终萦绕于历史的天空。

《论语》对领导观念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这里主要谈三个观念：权力观念、政绩观念和自律观念。

1. 权力观念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权力的本质。西方讲“君权神授”，中国称皇帝为“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希望借助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赋予，来证明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上帝也好，天神也好，对子民总是仁慈的，是要用自己强大的力量保护万众的。所以儒家对帝王提出的要求是“敬德保民”，天子如此，百官亦当如此。在权力的使用上，《论语》讲“使民如承大祭”（《颜渊》）。要慎重，要严肃，要怀有敬重之心，绝不可如杜甫《兵车行》所云那般“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权力的滥用，将严重削减政权自身的威信。虐民以自肥，既是对民众的不敬，也是自掘坟墓。在权力的获取上，孔子反对投机钻营、上蹿下跳的“跑官”行为。他认为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下是能否获取权力与地位的关键因素，处于官僚链条中的人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强化行政能力上。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位子有的是，就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站在那个位子上。类似的话他还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如果能力不够，占着那个位子也是相当难受的，患得患失，坐卧不宁。“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如此一来，能力不足的人为保住位子必然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难想象，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的权力是不大能够使用得当的。

2. 政绩观念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官一任，应当造福一方，“青史留名”是古人特别看重的行政绩效。当然，有的政绩是人人都能

看得见的，比如开疆拓土、整饬军备、修路架桥、盖楼筑城、GDP、工业园、开发区，即所谓“硬实力”。也有的政绩是人们看不见的，比如民心淳朴、百姓教化、文化繁荣、宗教自由……即所谓的“软实力”。看得见的政绩实现起来相对较快，看不见的政绩实现起来就要慢一些，甚至到离任之时也难以显现。短视的领导往往不愿意做“栽树”的前人，似乎后人乘了凉自个人心里就不平衡。但不管怎么说，政绩总是很重要的，否则便是“行政不作为”！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那基本上说算白活了。官员的任期是有限的，可做的事情却是无限的，所以总得拣重要的做。子贡问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条不可缺少。子贡又问：“如果条件不成熟，只能做到两点，那么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说：“去兵。”解散了部队，只要老百姓吃饱了肚子，那一旦有战事，“人心齐，泰山移”，一支保家卫国的队伍还是能够拉得起来的。子贡再问：“如果还得去掉一条，那您选啥？”孔子语重心长地教诲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人民对政权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如果百姓不信任政府，“忠”、“勇”从何谈起？谁会为政府浴血奋战？纵有千军万马也枉然哪！所以领导人在政绩建树上对这一点万不可忽略。

政绩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循序渐进才是正途。子夏为莒父的地方长官，向孔子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这是政绩建立的两条原则。“急于求成”等同于拔苗助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势必催生急躁情绪，急躁而又不成，那就只有“欺骗”这一招了。上个世纪的“大跃进”给我们民族发展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人们在那个特定年代的盲目热情最终兑换成极大的代价，也再一次验证了圣人之言穿越数千年的警世之力。水稻亩产十几万斤的“卫星”铺就了某些人的升迁之途，蒙蔽了最高领导人的双眼，可毕竟难以掩饰群众腿上的浮肿和目光中的失望与怨艾。同时，急促的脚步也使人们应对意外的能力大幅下降。有一

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山间羊肠小道上，有一个人挑着担子赶路，问一老者自己在天黑前能否到达目的地。老者望着他匆匆忙忙的样子，说：“你要走得快了就到不了，走慢了就能到。”他不信，加快了步伐，想不到一步踩空，滚落山下。这时再想起老人的话来，悔之晚矣！

3. 自律观念

冯梦龙在《三言二拍》中这样总结普通人在人生修养上面临的四道关隘：“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乃英豪。不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煞是精辟。领导干部既是常人又不同于常人，在这些关隘前遭遇的诱惑更多。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练就过人本领，以党纪、国法、制度、道德做好自我约束。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可惜今天继承下来的多是其糟粕，比如“喝酒就是为了工作”乍一听绝对是胡说八道，但到基层单位却的确是这么回事。假正当行政事务之机拿酒捉弄人、报复人、要挟人的现象并不稀见，也有不如意者借酒浇愁、心怀鬼胎者酒不醉人人自醉。但不管哪种情况，领导干部倘若在下属面前常常是醉醺醺的样子，总归不是一件好事。孔子的酒量我们无法考证，但他确实以此自豪：“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在那个时代，酒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礼之人无论如何不能沉溺其中，那样是会误大事的。

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所以“美人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试不爽，久演不衰。好色，是男人的本性，其实也是无可非议的，它起码证明你功能健全。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把握好度，“好色不乱”更不淫，才是君子所为。秀色可餐，可欣赏可品评，但不可玩弄。古今中外，领导层总是男人的天下，大权在握，搞一点“权色交易”就成了常有的事。封建男权社会的重要衍生物就是男人对女色的享用心态，不是怜香惜玉，而是以奴待之，对女性缺乏足够的尊重。这是需要大加挞伐的。孔子训诫弟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足以证明人们对色的追求是自然本能。他曾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南子私行有秽，坊间颇有

非议。子路对此亦耿耿于怀，逼得孔子指天赌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党员领导干部在这上面更应注意。前两年张钰公布性爱录像的事件就很是值得掌权之人深思。

拿挣钱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事业成败，是当下不少人的价值观。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不是开车来的先矮人三分，开个夏利也不好意思往停车场放，张口先问现在一年能弄多少万。在这样一种重视物欲的环境下，加上长期以来公务员的低薪制，权力寻租、“见钱眼开”、“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就司空见惯了。其实，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如此得来的钱财放不安稳，或者用迷信报应的话说就是“来得容易去得快”，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钱财的中转者而已。靠劳动拿报酬，拿得心安理得，踏踏实实。涩泽荣一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为日本的大国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号召日本企业家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前者代表“利”后者代表“义”，义利结合，方为坦途。而靠压榨员工、偷税漏税、以次充好等不当手段起家，最终难成大事。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论语》中“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观点的警世之功，也使从政者由此领悟“权钱交易”的道德之害。

气，是个人自尊的过度保护与虚荣心的盲目扩大。别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一个意义暧昧的眼神、一个极为微妙的动作，都会挑动他脆弱而敏感的神经，为保护自我、维护自尊便大动干戈。这是市井百姓之“气”。孔子称之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颜渊》）对为官者而言，要慎防在同僚之间使骄气、下属面前耍官气、上级面前露傲气，在战略决策上，更不得意气用事，那是在拿事业作赌注。郑之相国子产可谓这方面的典范，孔子说他“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对自己、对上级、对百姓分别表现出自敛、敬重与义气，一切都从国家大义出发，放弃个人所谓的脸面、尊严、利益，也就赢得了方方面面的普遍尊重。

二、《论语》中的领导形象

现在倡导“内练素质，外树形象”，说明组织部门认识到了领导人形象的重要性。有一位大领导说，“领导人坏了形象，比大姑娘丢了身子还难受。”诚哉，斯言！话糙理不糙。古代文人雅士都特别看重“清名”，爱惜自己的羽毛，今天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又如何能不自重？

《论语》中有一个相当完美的“君子”形象，它凝聚了孔子对世间所有美德的向往，也是孔子自律和他律的准则。准确地讲，这是孔子对处于由被统治阶层向统治阶层过渡的士子们提出的道德修炼要求。其实，在孔子那个时代，“君子”的概念就是指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把它等同于领导人应该不会错。关于“君子”的品德特征，他规定为如下几点：以道自任，重义轻利；仁慈宽厚，忠信坦诚；博学多才，讷言敏行。

“君子”形象包含诸多要素，概而言之，即仁、义、忠、孝、信、礼、勇等。

“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范畴。“仁者爱人”是寻常百姓对“仁”的简单理解。曾荫权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过香港特首委任状时，总理以《论语》中曾荫权 74 代祖曾参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勉励之。既然肩负着全港人的重托，曾氏就不能像农村老汉那样吃饱饭蹲在墙根晒太阳，也不能像日本前首相森喜朗那样对国民冷漠——下边已经报告“爱媛号”渔船倾覆，死伤无数，他却关掉手机，依然故我地继续着高尔夫。事后他辩解说已经交代下边的人去处理好这事，但关键时刻他没有和国民站在一起，显然是令国民失望的。“仁”具体到带兵人身上，就是“爱兵如子”，切实关心士兵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在生活、执勤、战斗中处处表现出组织的关怀。韩国警察大学前校长在一次演讲中说，他在任首尔警察机动团团团长时，首先启用装甲车，以减少警员损伤。

过去我们批判“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自

私自利，其实换个视角看，这句话也是蛮有道理的。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扫干净了，整个世界不也就干净了吗？所以干好本职工作，出色地完成岗位要求，就是最大的“忠”。总统、总理、董事长、省长、州长、支队长、政委、机关干部……各有自己的职务要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忠诚论”就颇为高明：“当我们争论一个问题时，忠诚意味着你把真实想法告诉我，不管你认为我是否喜欢它，意见是否一致。但是一旦作出决定，争论终止。忠诚意味着不折不扣地按照决定去执行，就像执行你自己的决定一样。”

《论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领导形象的完善，需要不断学习。只有当领导人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内涵和精明才干，外表上彬彬有礼，才能称得上一个完美的“君子”。于是，他提出了“文质彬彬”这一理想人格模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文”与“质”处于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个人而言，如果其内在的质朴纯直远远超过其外示于人的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蠢笨；如果在别人眼中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但缺乏质朴之美，那就无异于轻浮虚夸之徒。“文”与“质”的适度配比，是领导人十分重要的人格特征。

三、《论语》中的领导行为

《论语·子路》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平时能不能严于律己，关键时刻敢不敢喊出“跟我冲”，是检验一个领导人领导品格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只有摒除了利己思想和明哲保身的意识，才能规范自己的领导行为，收到良好的领导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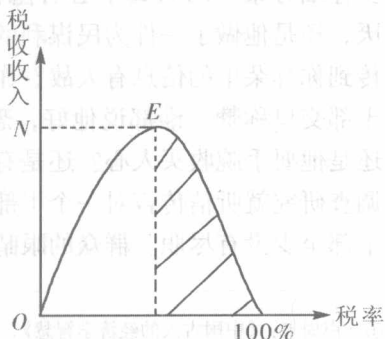
1. 施惠于民

税收是国家控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有了名目繁多的税种：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土地交易税、印花税……总之，只要百姓进行生产和商业活动，有收入，国家就要从中征收税钱。

通常情况下，税率越高，税种越多，税收就越多。但如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情况恐怕就要发生变化。孔子时代的鲁哀公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惑。《论语·颜渊》中，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国君感觉自己国库里钱不够多，问有子怎么办。有子劝他实行十分之一税制，就是从百姓收入里抽取一成。哀公说，我现在抽两成，都还不够花，一成不更少的吗？有子的回答给他算了一笔政治账：你少收点税，百姓生活富足了，安居乐业，勤奋劳作，才有能力按章纳税，你国库里自然就有钱了；如果征税过重，百姓饿肚子，那他只有两条路，一是想办法逃税，二是偷盗抢劫。前者让你收不到税，后者让你不但收不到钱，反而还得花钱雇用更多的警察来对付他们。你自己去掂量轻重吧。这则对话，不像我们过去理解的“藏富于民”那么简单，它隐含着—个十分重要的税收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发生大危机。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还被不少西方国家奉为“国策”。其好处是主张国民消费，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其弊端则在于到了一定阶段容易导致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果然，到7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暴露无遗。1974年，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南卡罗来纳商学院教授阿瑟·拉弗即兴在华盛顿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表明税率与国家总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这个平面坐标曲线的横轴是税率，纵轴是国家总税收。当税率从零开始上升时，国家总税收随之上升；当税率上升到峰值时，



国家总税收达到最高点，这一点也被视为最优税率点。但如果税率继续提高，国家总税收反而开始下降；当税率达到100%，即将经济人所得全部征为税收后，国家总税收将降为零。图中阴影部分，就是税收的非理性区域。^①

有若的想法与“拉弗曲线”理论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二者相距两千多年。2008年中国股市的印花税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理论。印花税作为一种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政府对股市进行调控或是决策层稳定市场的信号与手段。为控制股市过热，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在凌晨上调印花税从1‰到3‰，被网友讥为“半夜鸡叫”。仅2007年，国家从股民手中征去了2005亿元印花税。但直接后果是，股市暴跌，市场信心受到重挫，沪市股指从10月16日的6100点一路狂泻到2008年6月的2700点，交易量严重萎缩，政府当然也征不到多少印花税了。所以，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股市，像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几个主要金融市场，投资者买卖股票，或是根本不需要缴纳印花税，或者就是税率很低。

2. 做好干部工作

这里说的干部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考察、举荐和提拔。

首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仔细考察一个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也就是说，当人们众口一词否定、贬抑、诋毁一个人的时候，作为领导者，一定要仔细考察，因为其中必有隐情——是他真的很糟糕很令人生厌，还是他做了一件为民谋利的事却触动了少数人的利益？还是传到你耳朵里的信息有人故意作了筛选？相反，如果人们对一个干部交口称赞，谁都说他好，恐怕其中也有问题——是真的好，还是他要手腕收买人心？还是有人故意操纵舆论造势。总之，不调查研究就听信传言对一个干部做出否定性评价，那你这个领导干部至少没有尽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民意在特定条件下

^① 卢周来：《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智慧》，《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0日。

的盲目性也不容忽略。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子贡问孔子，说满村子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够好吧？孔子说，不行。子贡有所不解，心想能得到全体群众的拥戴，多不容易啊！难道还能怎样？就问了一句反话：“那全村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这同样不行。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嫌极端。如果一乡之人皆好之，那说明他是好好先生，谁也不得罪，做事肯定有丧失原则、和稀泥的地方。如果一乡之人皆恶之，那说明他事情做得不妥当，人际关系也不好。最佳状态应该是“中庸”一些——满村子里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这说明他行事端正，为广大群众谋福利，所以好人都喜欢他。同样因为行事端正，他得罪了一少部分人，这些人都厌恶他。但是，没有关系！公道自在人心！

其次，考察的注意点是什么？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论语》中保留下来的这一则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认识一个人，千万不要把他的言辞表现与人品才能相挂钩。说得漂亮不见得就做得实在，做人不实在也不见得他说的话都不可靠。台上讲反腐败慷慨激昂的官员，可能台下搞腐败比谁都厉害。这样的事例已经是不胜枚举了。如果上级组织部门仅凭其台上演讲“以言举人”，那就错了。这也应了那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再次，考察的方式又如何呢？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孔子在这里讲了观察人的三个视角，这三个视角是有层次感的：“视其所以”是看其做事动机和出发点，“观其所由”是从整体上看其做事手段，“察其所安”则从细微处看其志向情趣。周亚夫是汉景帝的股肱重臣——丞相，战功赫赫，献言献策，忠心耿耿。汉景帝在选择辅佐少主的辅政大臣时，自然要把他列为候选人，借设宴之机“察其所安”。有一次，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大